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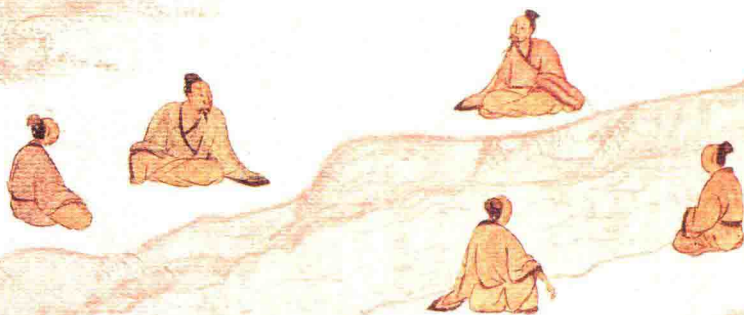
国际儒学研究丛书



Leo Tolstoy,

托尔斯泰和 中国古典文化思想

吴泽霖 著



THE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赫本斯利和
中國古典文化思想

1994 年

国际儒学研究丛书



Leo Tolstoy

托尔斯泰和
中国古典文化思想

吴泽霖 著



Copyright © 2017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托尔斯泰和中国古典文化思想 / 吴泽霖著.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6
(国际儒学研究丛书)
ISBN 978-7-108-05777-8

I. ①托… II. ①吴… III. ①托尔斯泰 (Tolstoy, Leo
Nikolayevich 1828-1910) — 关系 — 中华文化 — 研究
IV. ① I512.064 ② 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91658 号

特约编辑 赵庆丰

责任编辑 朱利国

装帧设计 刘洋

责任校对 龚黔兰

责任印制 张雅丽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铭传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17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28.25

字 数 377 千字

印 数 0,001—3,000 册

定 价 68.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再版赘言

20年前写这本小册子的心思情境有点难以捉摸了。记得在为一部部“舶来”的东西雀跃得有点数典忘祖的时候，看到一位世界文学和思想的巨人在自己的作品著述、书信日记中，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说过那么多动人的话语，看到他真诚地把中国思想“极大”的影响和自己思想体系成熟的年代联系在一起，看到他把后半生的多少精力倾注在和与中国思想相关的思考、论述、宣说、翻译、编写、出版工作里，你总会觉得激动。不过写这本小册子的更大动力，大抵是我越发感到，在托尔斯泰对中国思想关系中，有着一些值得思考的东西，这就是还想在此赘言的几点。

首先，对于托尔斯泰和中国古典文化思想的广泛契合，中国学者喜欢这样来判断，比如说，“托尔斯泰非常欣赏老子的‘道’和‘无为’的思想，后来就把它发展成为‘不以暴力抵抗邪恶’的理论”（戈宝权《托尔斯泰和中国》）；比如认为，“托尔斯泰完全皈依了老子的‘无为’思想”（周均美《托尔斯泰和老子》），等等。似乎不愿意看到一个重要的事实：托尔斯泰与中国古典文化思想的诸多契合，是在他尚未着意地涉猎中国文化思想的情况下形成的。这本来无伤于中国思想，而恰恰证明它不是一盘需要精心保鲜而千里迢迢特意运给托尔斯泰的特色佳肴，而是具有历经宏大时空而栩栩如生的普世性。走着历史沧桑大道的人类，总会和这些思想中的真谛、精髓相邂逅、相汇通，成为人类的共识，而显示出其普世性的价值。只是在俄国，在正转向宗法农民立场的托尔斯泰，对这发育于东方农耕的宗法社会、统治着中国亿万宗法农民的思想，更情有独钟罢了。维谢洛夫斯基（1838—1906）著名的“迎汇

的潮流”的概念就指出，在相似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意识形态的各种相同形式有其得以发展的必然性。所以托尔斯泰一旦着意接触中国诸子的思想，就如水到渠成、一拍即合、顺理成章，形成托尔斯泰独特的“中国热”。因为“真正的影响永远是一种潜力的释放”（卢卡契）。

其次，在托尔斯泰真诚的“中国热”中，我们注意到，托尔斯泰从来不是一个虚怀若谷的“皈依者”和悉心崇拜的狂热信徒，不是去为皈依“正宗”而努力泯灭自我、否弃自我的“自我灌输”。托尔斯泰是在自己的精神危机和激变的困境中，在广泛阅读东西方经典著作的精神探索之中，走近中国古典文化思想的。他绝无“游于圣门而无文”的小家子气，更没有“不敢有自己的观点”的奴才相。对诸子各家，托尔斯泰从不意在守持某派之说。他如蜂蝶之采蜜，兼收并蓄而取其精华、否弃其“不对”，绝不因崇仰而苟同、含糊。他对诸子的专门研究未必通透，但从中却能精准敏锐地抓住和自己的探索相关的精髓，而其思想根基就在托尔斯泰启蒙主义的民主思想中。

托尔斯泰是作为一个真诚的求知者，向中国思想学习求教、提问质疑。也正因此，他才会敏锐地抓住这种思想的真正深邃之处、抓住这种思想中最核心的、最有生命力的东西，把这些思想和他的自我精神完善、反对暴力的思想追求融为一体。而对于比如孔子的身份等级的观念、“礼”的思想、什么爱有差等、什么女子小人难养也等，他置之不顾，也不认孟子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天下通义。即使在他极力赞许的墨子的“兼爱说”中，也发现有“他的不对之处”：因为墨子功利主义地把爱视为工具，“他想改造这种爱，向人们教习这种爱”。在托尔斯泰那里，中国思想有幸遇到了一位思想敏锐的真诚的求学者、切磋者和发扬者，而不是“真理的阿谀者”。因为真理是不需要阿谀的。

托尔斯泰回答俄国神圣宗教会议开除他教籍的裁判时，这样说：

我不认为，我的信仰是唯一的、永远不可置疑的真理，但是我还没有看到另一种能够更为简单明确、并能合于我理智和心灵要求

的信仰。而一旦我认识到这种信仰，我会马上接受它，因为上帝除了真理什么也不需要。

没有永恒的皈依，唯真理而是从。中国思想需要这种真理追求者，需要对它的开辟扬弃、砥砺琢磨。中国思想从来不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不是一手经书，一手利剑。从来不自诩已登绝造极、不容置辩、是绝对真理的标榜。中国思想之道，其本质就是不断地探索真理之道，而不是封闭真理之道。儒家的大学问是切问近思、反身而诚，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谨慎自谦，是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是完善自我的永远追求，是和而不同的宏大胸怀和视野。

所以，最后才要提到，托尔斯泰晚年最重要的一个思想和工作，就是把他自己所珍惜的中国思想，不是奉为不可商榷、不可逾越的“立极”的经典，而是汇入人类几千年精神探索的长河和宝库。托尔斯泰确认全人类有着历千百年而得来的共识性的思想和道路。而这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总是体现于各个文化的独特性之中。所谓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或者说，各个文化，无论自身经历多少曲折坎坷，总是在用其具体而独特的脚步走着人类共同的路子。真正有价值的、有前景的文化独特性总是包含着人类文化的普适性。它的实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是天下归心的。而那些只在某种文化中才存在，和人类文化发展的大道格格不入的所谓特征是肯定没有前景的，在人类历史中只能是昙花一现的过眼云烟。

正是这种欲融全人类真知为一体的思想，使托尔斯泰把中国诸子思想纳入人类哲人之思的大河中，撞击砥砺，损益扬弃，愈见真灼。比如，在指出“老子学说的基础，也就是一切伟大的、真正的宗教教义的共同基础”的同时，托尔斯泰又对自己编著的老子做着大量删改工作。托尔斯泰晚年编写的一系列汇集世界哲人之思的语录体著作，使我们感到的，不是分辨百家的察异心态，而是一致天下的求同之忱。书中所引述的，从《新约》、孔子、孟子、老子、佛经、穆罕默德，到康德、叔本华、亨利·乔治……虽然都各有论述，侧重不同，甚至时有抵牾，但

同时又都是在从不同的角度论证着、成就着同一个真理——生命之道。在这些被斥为“有意识的折中主义”（C. H. 布尔加科夫）、被笑为“是托尔斯泰本人的沉默”（别雷）的汇集中，托尔斯泰实践着孔子的不言之教，实践着中国人的和而不同的宏大思想。

托尔斯泰对中国思想的探索，融汇在他终生的精神求索之中。他像孔子一样，一生都没有悟得过心安理得的清闲境界（不如我们当代的一些儒学新秀）。孔子誓为行其道而不惜“乘桴浮于海”；为践行自己的思想索求，托尔斯泰终于决绝地演出了那悲壮的冬夜出走的诀别。这种对自我精神价值和精神力量的自信和追求，也是一种共同的人类精神价值吧。

再版补入的几篇文章都是后来发表过的，属于本书主旨的一些延伸。而其中《托尔斯泰在中国现代文化演进中的命运》一篇，实际上是我认为十分有价值的一个重大课题，只是由于自己功力不够而没能展开研究，且附在上面，只盼抛砖引玉，得到大家们的深入研究。

吴泽霖

2016年2月

引言

对研究托尔斯泰和中国古典文化 思想关系问题的思考

托尔斯泰和中国古典文化思想的关系，很早就成为人们关注的课题。这不仅是因为托尔斯泰在思想求索过程中执着地向东方古典文化思想，特别是向中国的孔子、孟子、老子、墨子等人的学说寻求生活真理，对他们的学说进行了积极的译介和研究，而且还由于在19—20世纪之交的世界动荡危机之中，他心系东方，瞩目中国，把人类社会的前途和希望寄寓其上。可以说，托尔斯泰是俄国古典文学家中和中国文化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人。

早在托尔斯泰生前，人们就指出他是“东方因素的最充分的表达者”^[1]，几位最早为托尔斯泰作传的人，如罗曼·罗兰、比留科夫，都指出他和东方特别是中国的文化思想的密切关系。列宁也多次谈到托尔斯泰和东方的问题。

那么，如何认识托尔斯泰和东方、和中国的关系问题呢？1925年，

[1] 倪蕊琴编选：《俄国作家批评家论列夫·托尔斯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59页。

俄人比留科夫的专著《托尔斯泰与东方》一书，收集了托尔斯泰有关中国的言论和交往资料，并在前言中论述了中国古典文化思想，可以说是这一专题研究的第一本重要专著；美国学者邦德1950年写了《托尔斯泰与中国》一书，更详细地从托尔斯泰的道德精神探索的角度记述了托尔斯泰与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的关系。他从托尔斯泰不同时期对中国先秦诸子思想的关注点不同出发，把中国古典文化思想对托尔斯泰的影响分为19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20世纪初三个时期。不过，作者还未从托尔斯泰的道德精神探索的历史背景上，结合托尔斯泰的艺术实践进行更深入的分析；苏联学者A. И. 希夫曼在1960年发表的《列夫·托尔斯泰与东方》一书，更在前人的基础上，以更加丰富的资料论述了托尔斯泰与中国先秦诸子学说，以及中国古代民间文化的关系，还记述托尔斯泰作品在中国传播的一些情况。可以称为是国外研究托尔斯泰与东方这一课题的较翔实重要的力作。作者还对托尔斯泰和印度、日本等亚非民族文化的关系进行了论述。但是这一著作对托尔斯泰和中国古典文化思想的关系的研究，仍还限于对托尔斯泰与诸子的关系进行逐一的、隔离的研究，未能把中国古典诸子的思想统一为一个整体。而且我们国人读起来，总有些“隔”的感觉。不过，正如希夫曼所说，该书并不奢望对托尔斯泰的社会政治和哲学观点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而其主要目的是揭示托尔斯泰和亚非人民的广泛联系。^[1]

实际上，对于中国古典文化思想的域外影响及认同关系问题，本应当成为我们中国人研究的重要课题。在我国，从20世纪30年代便有研究托尔斯泰与东方、与中国关系的著述出现，如《托尔斯泰与佛经》（胡怀琛著，上海佛学书局，1934年版）、《由托尔斯泰与墨子的宗教观念说及中山先生的仁爱》[有名（人名）著，载《钦县》1934年7月]、

[1] Шифман А. И. Лев Толстой и восток. Москва Восточ. лит. 1960. С. 6.

《托尔斯泰与东方》(愈之著,载《东方杂志》25卷19期)等。不过只是到了80年代以后,托尔斯泰和中国文化这一课题的研究才愈发得到重视。戈宝权先生的《托尔斯泰和中国》(1980)一文全面地概述了托尔斯泰和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关系,他对中国人民命运的关注,以及托尔斯泰的作品在中国译介的情况,成为新时期国内有关这一课题的发轫之作。继而十余年来,我国学者发表了一些各有见地的论文,讨论东方文化特别是先秦诸子对托尔斯泰的影响。如鲁效阳先生的《试论托尔斯泰的宗教思想》(上海师院学报1981年第1期),周均美先生的《托尔斯泰和老子》(华东师大学报1982年第5期),桂未柔的《爱的启示》(是研究托尔斯泰和墨子思想的,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列夫·托尔斯泰比较研究》一书,1988年版),刘文荣先生的《托尔斯泰与中国》(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俄国文学与中国》一书,1991年版),郑万鹏先生的《托尔斯泰与东方文化》(《中国文化研究》1995年冬卷),王景生先生的《列夫·托尔斯泰研究中的比较问题》(《四川外院学报》1995年第3期),李明滨先生的《托尔斯泰与儒道学说》(《北大学报》1997年第5期),以及拙作《托尔斯泰和中国古典文化思想》(《苏联文学》1992年第4期)等。一些国外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有零星译介,如《国外文学》1991年第4期所载苏联人伊·李谢维奇的《托尔斯泰和老子》。

从这些研究著述中,可以看出我们国内对托尔斯泰与中国文化关系的研究是在逐步深入的:从对托尔斯泰与儒释道,或与孔子、老子、墨子的关系进行分离的、孤立的研究,走向把中国古典文化思想作为一个整体而进行综合性的研究;从对托尔斯泰和孔子、孟子、老子、墨子的言论思想进行单纯的类比研究,走向把托尔斯泰对中国古典文化思想的认同和借鉴,置于他的精神求索进程之中来研究;从只局限于“思想家托尔斯泰”的政论思想的研究,走向把“思想家托尔斯泰”和“艺术家托尔斯泰”相统一,联系其艺术实践、生平事迹,力求做到知人论事,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在研究中,人们也愈来愈注意到托尔斯泰所处的时

代背景和俄国民族文化传统的因素。比如，在郑万鹏先生的《托尔斯泰与东方文化》一文就论及了俄国的一些东方文化传统和中国古典文化传统的相近关系。值得一提的是刘文荣先生在《托尔斯泰与中国》一文中，从现代比较文化学的观点出发，引入了一些研究者区分东西方文化的两种心态：“wonder”（求知）心态和“concern”（关切）心态^[1]，借以分析托尔斯泰接受中国古典文化思想的动因。这些都说明，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已经开始从资料收集、事件列举、言论对比，逐渐进入系统性、规律性的整体研究。

笔者认为，在这方面，这一课题的研究还是大有可为的。

第一，目前诸多有关论著，还仅仅把托尔斯泰和中国古典文化思想的关系，单纯作为中国古代哲人思想对托尔斯泰的影响来研究。尤其是中国学者，往往过高地估计了我国传统思想对托尔斯泰的影响，比如认为，“托尔斯泰非常欣赏老子的‘道’和‘无为’的思想，后来就把它发展成为‘不以暴力抵抗邪恶’的理论”（戈宝权《托尔斯泰和中国》）；又比如认为“托尔斯泰完全皈依了老子的‘无为’思想”（周均美《托尔斯泰和老子》）。实际上，托尔斯泰即使是在精神激变的紧张求索中，也从未曾悉心地认同过任何一种哲学思想。托尔斯泰思想的东方色彩并非仅靠他晚年对东方文化的涉猎所能形成，他对东方哲人的思想，包括对中国古典文化思想的接纳，远非一种虚怀若谷的皈依。只有顾及托尔斯泰思想形成和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及托尔斯泰精神探索的整个历程，分析东西方文化思想的矛盾与交融的复杂关系，才能看到中国古典文化思想何以会受到托尔斯泰的青睐，它们又以某种方式融入托尔斯泰的思想，并在其中占据着怎样的地位。

因此，单纯的文化影响研究显然是不够的。对于这一课题，应该把

[1] 智量等著：《俄国文学与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67页。

文化的历史比较研究和影响联系研究相统一。既承认不同文化间的影响关系，又承认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共同过程具有一致性和规律性。不同民族文化思想，在没有直接相互影响的情况下，也可能出现历史类型学的相似和吻合，形成全人类的普适性的思想。

而对于影响的研究则应当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之中探索接受影响的内在根据。任何影响的产生都不是偶然的，都不是单纯来自外部的机械性推动力的结果，而是有着社会制约的规律性的。它取决于民族、社会、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为使影响成为可能，就必须存在着输入这种影响的社会内在要求。俄国历史比较文艺学的奠基人亚·尼·维谢洛夫斯基（1838—1906）早在19世纪就提出著名的“迎汇的潮流”的概念。他指出，对别国文学影响的“借用要求于接受者一方的不是空地，而是迎汇的潮流，是相似的思想方向和相近的幻想形式”。“迎汇的潮流”的理论依据是，在相似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意识形态的各种相同形式得以发展的必然性。而且这种影响的实现，也不可能是对原有文化现象的一成不变的模仿，而只能是为适应接受主体的文化框架而形成变形。实际上，接受影响的结果，最终总是形成民族文化的融合。

具有东正教文化传统和家长制村社基础的俄国，在社会文化诸方面有着与西方文明非常不同的东方文化色彩；而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对俄国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以及俄国固有的东方文化传统，自然都会成为托尔斯泰思想和中国文化思想形成暗合的原因，成为托尔斯泰接受中国古典文化思想的前提。而19世纪世界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乃至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而在全世界穷兵黩武，深刻地影响着俄罗斯民族对于“路在何方”的思考。在俄罗斯思想之路上，斯拉夫派、西欧派、自由派、革命民主派、根基派、民粹派……对于这个问题的思索以及相互之间的思想斗争，俄国19世纪坎坷的现代化进程，乃至托尔斯泰本人的东方型精神气质，这些都构成东方的思想、中国古典文化思想对托尔斯泰产生影响的具体背景条件。据

此，我们才可能比较客观地认识托尔斯泰与中国古典文化思想的关系。

此外，在不同文化间的影响关系上，不应该把“在社会发展中走在前面的民族的文化对社会关系比较落后的民族的文化发生影响”的一般规律绝对化。产生于过去时代的，或存在于落后的社会形态中的文化，也必然有着没有成为过去的、保持着永恒价值的东西，具有借鉴价值，因而也就具有深远的影响力。这正是在评价托尔斯泰接受中国古典文化思想的时候应当注意的。

第二，目前的研究中，往往局限于逐一地讨论托尔斯泰和先秦诸子间的思想关系。比如，希夫曼的《列夫·托尔斯泰和东方》一书中，就是以托尔斯泰分别与老子、孔子、孟子、墨子思想的关系为线索进行论述的；而我国学者就更喜欢对托尔斯泰与某个先秦哲人的思想关系进行单独的论述。然而这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托尔斯泰和中国先秦诸子思想的关系，绝非孤立地——“媾和”，如简单地取老子的“无为”，孔子的“仁”，墨子的“兼爱”“非攻”等。实际上，即使在晚年，托尔斯泰对诸子思想的把握也未十分精当。比如，1906年托尔斯泰在给中国学者辜鸿铭的复信中谈到，如果中国人遵循自己的“三种宗教”，“那么他们现在所遭受的一切痛苦将会自行消失，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使他们屈服”。托尔斯泰指出，“这三种宗教的道义是相符合的，就是要从一切人的权力统治下解放出来（儒教）；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道教）；实行自我牺牲，温顺，对一切的人和一切的生物都要慈爱（佛教）”。而我们知道，“从一切人的权力统治下解放出来”，并非儒家的社会理想，倒是道家的任自然、反礼法，对人类社会制度所持的疏离的、消极的态度，似乎更可以与这种思想相比附；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恰恰不是道家的言论，而是儒家鼻祖孔子的箴言（见《论语·卫灵公》）。

看来，托尔斯泰并不是把东方文化思想作为派别分立的学说来分别加以接纳的，而是将其视为“道义相符合”的统一的东方思想体系来借鉴的。因此，研究托尔斯泰和中国古典文化思想的关系，绝不能斤斤于

对诸子言论的字比句次的牵强比照，而应从整个中国古典文化思想体系的宏观角度进行综合性的研究。比如说，上述从所谓“wonder”心态和“concern”心态的角度，对托尔斯泰接受中国古典文化思想所进行的宏观性的研究，就促使人不能不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中国古典文化会倾向于“concern”心态，为什么托尔斯泰作为一个基督徒，会“舍弃了基督教的wonder成分，而强调其中的concern成分”，为什么这样一来，托尔斯泰就特别和中国的，而非印度、日本或其他亚洲的文化思想结下不解之缘。看来，从文化比较的宏观角度进行研究，还大有可为。

第三，目前这一课题的研究，一般还只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托尔斯泰精神“激变”时期之后，即其着意研究介绍东方文化思想的时期。因此，这些研究常常使人得出结论：似乎托尔斯泰只是由于攻读东方哲人的著作才一下子悟得了人生的真谛，从而形成托尔斯泰主义的。事实上，托尔斯泰主义的形成是托尔斯泰一生艰苦曲折的精神探索的结果，因此，对于托尔斯泰和中国古典文化思想关系的研究，便应该贯穿到托尔斯泰一生的精神探索中，从而看到托尔斯泰整个精神探索历程的东方走向。无论是托尔斯泰早年已经形成的关注精神自我完善的东方型精神气质、对东方民俗文化的喜爱，还是对卢梭学说、对叔本华非理性的醉心；无论是他的高加索从戎，还是出游欧洲；无论是他的农村改革还是亚斯纳亚·博利亚纳的教育实践，乃至他的包括《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在内的一系列创作实践；这些都是托尔斯泰整个具有东方走向的精神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他后期执着于中国古典文化思想的基础。

于是，就涉及在研究托尔斯泰和中国古典文化思想关系中的分期问题。如果把注意力仅仅放在托尔斯泰致力于研究中国古典文化思想的晚年时期，以至于过分看重托尔斯泰在不同时间对不同的东方哲人思想的涉猎而进行分期（如美国学者邦德和苏联学者希夫曼所作），那么就势必会忽略对托尔斯泰着意研究中国古典文化思想之前那几十年极有意义

的早期精神探索时期的研究，形成对托尔斯泰和中国古典文化思想关系的局限性的、表面化的观念。

与此相联系的是托尔斯泰阶级立场的转变，即平民化或向宗法农民立场的转变和他东方走向的精神探索以及认同中国古典文化思想的关系。我认为，这是相互联系、影响的两个问题，既不能混为一谈，也不能断然割裂。我们将讨论托尔斯泰的精神激变（一般指他的世界观的转变）是在没有中国古典文化思想的直接影响下完成的。同时，把托尔斯泰走向宗法农民的立场作为他必然接受中国古典文化思想的根据也是不对的。然而对于托尔斯泰来说，接受东方思想和接受宗法农民的世界观又是一致的。既然已经否定了西方资本社会而把目光投向东方农耕社会，托尔斯泰为摆脱宗法贵族阶级立场的危机，就势必走向宗法农民的立场；而中国古典文化思想正是形成于中国这一古老的宗法社会，是千百年来游刃有余地统领着千百万宗法农民的统治思想。托尔斯泰对这种思想的认同是不必跨越千山万水的。

第四，对于这一课题的研究，也应该本着把艺术家托尔斯泰和思想家托尔斯泰统一起来的原则进行。事实上，尽管这一原则得到普遍的认可，但是这并不妨碍诸多研究者在赞美托尔斯泰“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极高超的心理分析艺术”的同时，“一分为二”地把托尔斯泰作品中试图阐发的宗教的、哲学的、伦理的观点作为某种否定的东西，作为“愚蠢”，加以“剔除”，以保证托尔斯泰艺术的“纯洁性”；以否定思想家托尔斯泰来维护艺术家托尔斯泰的声誉。比如，人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表达着同一种意思：十分崇敬托尔斯泰的罗曼·罗兰就说，“我深深地热爱托尔斯泰”，而“我爱托尔斯泰，只因为他和他的学说毫无相似之处。”^[1]而对于托尔斯泰的反正教思想颇为不满的大主教沙霍夫斯科伊，也从另一个角度指责

[1] 陈燊编选：《欧美作家批评家论托尔斯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44、92页。

“作为思想家的托尔斯泰惊人的片面性”，甚至认为“其已趋于疲惫的艺术直觉所揭示的真实性也远多于他那趾高气扬的理智。”^[1]革命家普列汉诺夫更一言以蔽之说：“我认为，他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和极蹩脚的思想家。”实际上，早在19世纪80年代，托尔斯泰同时代人A·斯卡比切夫斯基在谈到托尔斯泰时就指出：“艺术家在藐视思想家，与之愤然对峙，走出自己的道路……”他说：“思想家在说一件事，而艺术家则向您表述着全然另一回事；思想家在要求艺术家如此这般地图解他的思想，而艺术家则在您面前，违抗思想家的意图，挥洒着艺术之笔。”^[2]

本文不想详细讨论关于作家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关系的问题，这里仅想指出，这种把思想家托尔斯泰和艺术家托尔斯泰对立起来的看法是片面的，它也必然导致对艺术家托尔斯泰，对托尔斯泰艺术作品的狭隘片面的理解。单单所谓“现实主义的战胜”，是无法解释一个“极其蹩脚的思想家”何以能创做出如此伟大的文学作品的。任何一部好作品都不可能是作家摆脱了自己的世界观，处于无意识状态的扶乩之作。尽管思想家托尔斯泰和艺术家托尔斯泰有着不一致的地方，但是，如果注意到，艺术创作本身也是思想探索的过程，那么，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的统一性、思想家和艺术家的统一性，应该是我们的基本研究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普遍否定思想家托尔斯泰的研究氛围中，对于托尔斯泰和中国古典文化思想的研究，恰恰是在“思想家托尔斯泰”领域进行的。正是否定托尔斯泰学说的罗曼·罗兰指出：“托尔斯泰感到在思想上与他最接近的是中国。”^[3]诸多这方面的研究论文都频频引述着托尔斯泰的政论、书信、日记，唯独极少涉及托尔斯泰的文学作品。

[1] Архиепископ Иоанн. *Революция Толстого* Нью-Йорк, 1975. С. 151, 198.

[2] Козлов Н. С. *Лев Толстой как мыслитель и гуманист*. М. Унивирс. 1985. С. 5.

[3] [俄]托尔斯泰娅等著，冯连骞等译：《同时代人回忆托尔斯泰》，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366页。